

蔣介石研究的成果、思路與未來設想

黃自進 陳佑慎

—

胡適晚年，談起籌建中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何以“不研究民國史”，說道：“民國以來的主要兩個人，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他的史料都在國史館裡；還有一位是蔣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誰能看得到？”胡適又以親歷的五四運動為例，認為後世書著多屬“只有黨派的立場，決沒有客觀的判斷”。^①胡適所言，點出了蔣介石研究，乃至於整體中國近代史研究長期面臨的問題：時代愈近，政治因素影響愈大，史料常不能公開，學者難作信史。無怪乎，許多前輩學人承認近代史研究是實際的需要，也是知識的需求，但又鑒於研究條件困難，遂鼓勵後學不必追求自我成功，“勤成刪定，歸之於後來之筆”。^②

而今物換星移，蔣介石相關的史料終於在台灣大量面世，加之蔣介石日記亦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完全開放，胡適當年提到的蔣介石研究、民國史研究之障礙，基本上不復存在。此時此刻，正是開展相關研究的大好時機。究其實質，蔣介石自 1920 年代以來，已是中國政壇上的領袖人物之一，主政中國大陸二十餘年。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失去大陸上的政權，但蔣氏仍持續主政台灣二十五年。可以說，蔣氏對近代中國的走向，對二十世紀東亞地區政治、軍事格局的形成，有其無庸置疑的影響。就近代史研究領域而言，蔣介石相關史事的研究，的確確是

二

大致說來，不論是台灣抑或大陸，在 1980、1990 年代以後，蔣介石書寫都有顯著的從“政治宣傳”向“學術研究”之轉變。至於歐美日學術界，也開始檢討過去的革命史觀框架，不再單純視蔣介石為“失去中國的人”。在這股新風潮之下，台灣得利於整體學術環境，以及史政機構的豐富史料典藏——尤其是台北國史館所藏的《蔣中正總統文物》，蔣介石研究的條件其實是有得天獨厚之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③、政治大學蔣介石事略稿本讀書會^④等學術社群，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獲致了相當成績。

惟無可諱言的是，回顧 1990 年代以來的蔣介石研究軌跡，台灣面臨的情況是，一方面政治禁忌解除、史料大量開放，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研究便利環境；但另一方面，台灣社會內部出現認同問題，再加上歷史學界方興未艾的“文化史轉向”，致使蔣介石研究、民國史研究的熱度有不易提升之憾，和大陸上出現的所謂“民國熱”恰成對比。此外，當今學界雖能逐漸破除政治宣傳、革命史觀的框架，如何突破狹窄的視野卻有待繼續努力。

例如，當今學界一般的共識是：讓蔣介石走下神壇或祭壇，回歸其歷史人物的本色，確有必要。但研究者實際去分析蔣介石這個“人”時，還是不免受到過去政治觀念的影響，甚至過分側重於討論蔣介石行事動機的是是非非，忽略了歷史事實與背景的深入探討。其實，所有歷史人物的公領域、私領域作為，多半是各種歷史現象的互動結果。即以1930年代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而言，就不是簡單出於反共意識形態，抑或是所謂“不抗日”的考量。細究起來，1930年代初期的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24省，直接統治區僅約10省。在這10省當中，竟有7省散佈中共紅軍的根據地。在剷除中共根據地並確保統治基礎穩固前，國民政府自然談不上建立舉國一致的備戰體制。其後，紅軍在國軍猛烈圍剿下存活了下來，成功轉移到陝北地區。可是，蔣介石仍趁著追擊紅軍之便，使中央軍深入廣大西南省區。抗戰軍興，西南地區能成為國民政府的抗戰根據地，與此有關。用陳誠的話來講，紅軍突圍是“失之東隅”，中央軍入西南卻是“收之桑榆”。尤值注意的是，蔣介石在致力消除內部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之際，更胸懷著誘導“日蘇先戰”的謀略。這一類問題，必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考察。^⑤

綜上所述，1930年代蔣介石的“安內攘外”、“經營西南”、“日蘇先戰”三大政策，是中國政治、軍事、外交內外權力關係互動的結果。研究者若欲理解環環相扣的歷史圖景全貌，必須在蔣介石的所見所思所為之外，多方參照不同陣營的史料，方可奏功。1980年代以來，學者面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間纏繞曲折錯綜複雜的關係，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聯蘇”或“聯日”路線的擺盪，以及國民政府對日本“和”“戰”的抉擇，各獻己力進行研究，成果堪稱可觀。對大陸學界來說，蔣介石歷史形象尤其有從“不抗日”、“消極抗日”到“領導正面戰場抗日”的演變過程。^⑥但無可諱言的是，長期以來，兩岸學術界和日本學術界對中日關係的歷史詮釋仍有顯著差異。推其根本，除了出於學術研究取徑的不同外，主要癥結還是在於傳統民族史觀的影響。

三

歷史書寫要超越單一國家視野，確非易事。研究者一方面受到所屬政治、文化脈絡的影響，下筆難免拘束於傳統民族史觀。另一方面，異國史料的取得、解讀、參照，確實也有較多的困難。此類問題的解決，唯待研究者的不斷努力。基本上，在各種跨國家的研究中，蔣介石所牽涉的中美關係問題，過去已有較多的學者投入，在今天的成果自然較為可觀。例如，2009年陶涵（Jay Taylor）所作的世人矚目之蔣介石傳記，一反過去歐美學界以成敗論英雄的見解，並拋開昔日美國公眾界受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事件影響所形成的蔣介石負面評價，認為一味指責蔣在二次大戰以及國共內戰的失利並不公允，美國支援國民政府不力是更應該檢討的課題。^⑦可是，和美國因素相較，蔣介石軍政生涯中的日本、俄國因素，學界的討論就稍顯不足了。

以蔣介石軍政生涯中的日本因素為例，1970年代，日本產經新聞社透過國民黨官方的協助，利用當時尚未向外界開放的“大溪檔案”（今《蔣中正總統文物》）等史料，出版《蔣介石秘錄》，即以“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為副題。^⑧然而，《蔣介石秘錄》畢竟問世於蔣介石研究條件未臻成熟的時代，書中蔣介石這個“人”似乎是消失了。其後，中英日文著作對於蔣介石人格形成及其權力關係中的日本因素，討論依舊相對不足，研究空隙較多。

究其實質，綜觀蔣介石的政治、軍事事業，美國因素的作用在1940年代以後才趨於明顯，反之日本因素卻幾乎是一生息息相關。首先，日本是蔣介石年少時學習軍事之地，亦為青年時期寓居之所。日本留學及工作經驗，對蔣人格的形成，軍事學養的養成，及爾後治軍、治國理念的

成形，當有具體影響。其次，蔣介石得力於長期留日，遂與日本朝野建立起密切的交流。此種交流，連結到國民黨與日本的互動關係，就成為近代中日關係史的醒目一頁。特別是，在國民黨的革命歷史中，日本堪稱是該黨的革命滋生茁壯之地。國民黨既已建立政權，蔣介石猶衷心主張中日親善，視日本為中國現代化的學習榜樣。

蔣介石與日本一度從友變敵，並釀成中日兩國全面戰爭的關鍵，在於 1928 年的濟南慘案以及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這兩個事件，突顯當時日本國策已轉向為打擊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並企圖鯨吞中國領土。主持中樞的蔣介石，處此情境，勢必得挺身抵抗日本強權，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然而，即使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蔣介石仍舊對日本有股特殊的情懷。1943 年 11 月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向英、美盟邦力主戰後應保留日本的天皇體制。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蔣介石再對日本揭櫫“以德報怨”政策，強調對日本寬大為懷。前揭政策的提出，或不無重建中日兩國新雙邊關係的政治性考量，但仍不失高瞻遠矚的表示，堪稱中日兩國戰後歷史和解的先聲。

當然無庸置疑的是，即使到了今天，日本與亞洲各國針對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和解，尚未真正得到落實。此間的原因很多，惟就歷史學研究的角度來說，可視為研究取徑、民族史觀之差異所造成的結果。大抵上，海峽兩岸學者傳統上傾向於將中日戰爭歸咎於日本明治維新後奉行的向外發展國策，認為日本侵略中國乃歷史的必然；至於中日兩國的全面衝突何時開始，端視中華民族何時覺醒、何時奮起反抗。與此相較，日本學界傾向於認為，中日兩國的全面衝突，既肇因於雙方長期的不信任感與敵意，更是一連串脫軌事件積漸所至；不論是九一八事變、蘆溝橋事變，乃至於戰爭的擴大，皆非日本政府的既定國策。基此思考，日本學者主要致力於大量歷史個案的細緻研究，主張日本實未妄圖長期軍事佔領中國本土。其間是是非非，牽涉了民族立場與戰爭責任歸屬的論辯，雙方公眾界、學術界多年來聚訟無已。

但無論如何，研究者應留意的是，回顧中日戰爭之起源、發展與影響，如不理解日本自身的具體歷史脈絡，根本就無從說起。特別是，蔣介石軍政生涯中涉及的中日關係、國共關係，錯綜複雜，牽一髮而動全身。研究者倘僅聚焦於中國內部的歷史發展，並僅取戰爭歷程之國共關係開展研究，如此作法固然仍有所得，卻不免是見樹不見林。至少，當今研究者應意識到中、日文歷史書寫對相關課題的宏觀、微觀取徑有所不同，各種歷史詮釋亦涉及了不同的民族立場。當此新資料不斷面世，且意識形態束縛大為減輕的時代，研究者自當反思並超越傳統的民族史觀。

四

綜觀晚近二十餘年來海峽兩岸的蔣介石書寫，確已做到從政治宣傳向學術研究的轉型；超越單一國家的視角，則是學術界當前及將來繼續努力的目標。2008 年 7 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蔣介石研究群”，集會所內研究人員及海內外學者（含括前揭的政大事略稿本讀書會部分成員），就是一次跨區域的“綜合研究”嘗試。中研院近史所蔣介石研究群發想之初，即刻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蔣介石研究會等學術社群的響應，共同籌設合作計畫。合作計畫歷時三年，從學術、人事、政治、軍事、外交、謀略、權力等議題進行深入研究，已分別在 2009 年 9 月、2010 年 9 月、2011 年 6 月於台北、北京、台北舉辦三次國際會議，並將研究成果輯為《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叢書，彙整了海峽兩岸、日本以及韓國學者的共同研究成果。⁹

基於前一階段的東亞各國學者蔣介石研究共同基礎，自 2013 年起，中研院近史所蔣介石研究群開始執行“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1850～1949）”院內主題計畫，仍集合海峽兩岸、

日本以及美國等地學者，分別就政治、外交、文學、經貿、文化、學術、媒體、宗教及藝術等不同角度，省思中日兩國近百年來交流互動的歷史面向，試圖為錯綜複雜的相關課題，開啟更廣泛的視野。研究計畫的初步成果是2013年11月舉行的“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涵蓋“學術論辯”、“國際政治”、“黨國改造”、“國共合作”與“中共崛起”等，並於2016年6月彙整出版。^⑩

2014年起，中研院近史所蔣介石研究群續進行“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省思”跨國研究計畫，預計於2017年6月結束。中日關係是貫穿蔣介石一生政治、軍事事業的課題，中日戰爭則是廿世紀中日關係史上最不幸的事件，對於戰後世界格局亦有深遠的影響。學界過去的研究難免受到民族主義、政治性意識形態的束縛，也不易超越單一國家的觀點。本研究計畫的宗旨即在避免前此的闕失，重新檢視中日戰爭對兩國帶來的衝擊及對往後歷史發展走向的影響。

蔣介石是近代中國史的主要領袖人物，也是二十世紀東亞地區的重要領袖人物。而今吾人藉中日戰爭等角度，重新審視近代中日關係史，可說是繼續發展蔣介石研究的必須，也蘊涵了深厚的現實意義。倘若今後研究者藉由共同研究的方式，培養歷史詮釋的共識，突破傳統“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研究角度，必可真正落實亞洲各國的歷史和解，並建立真誠的共同歷史認識。總之，蔣介石研究應在既有基礎之上，加強各國之間資料與詮釋的交流，激發新議題，不受傳統窠臼所限。這樣的方向，值得繼續努力。

①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北：聯經出版，1984年，第276頁。

②此為羅家倫之語，參見氏著：《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年，第76頁。

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由黃自進教授主持，研究成果後詳。

④政治大學事略稿本讀書會係由呂芳上教授主持，集合學者與研究生，自2008年起舉辦至今。此外亦與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機構，合辦蔣介石研究的小型工作坊，2010年迄今已有五次，期間出版了《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出版，2011年）；《蔣介石的日常生活》（台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2年）；《日記中的蔣介石》（台北：政治大學出版社，出版中）等書籍。

⑤參見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192～252頁之討論。

⑥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之相關討論。

⑦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中譯本在內容上有若干修訂，見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台北：時報文化，2010年。

⑧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蔣介石秘録》，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出版局，1975～1977年。中譯本見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録：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台北：中央日報社，1976年。

⑨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⑩黃自進主編：《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台北：稻鄉出版社，2016年。

作者簡介：黃自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陳佑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培育人員。

[責任編輯 陳志雄]